

不做“权利上的沉睡者”,让法律鲜活起来,于细微处改变我们的生活

他们为“千千万万个一元钱”打官司

本报记者兰天鸣

“诉讼这件小事队”“退不了货就嘤嘤队”“我行我诉啥都队”“灭霸美少女队”“诉得就是你鸭”……这些看似戏谑的名字来自一场大学生公益诉讼大赛。正如蚂蚁能举起体重数十倍的物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法学院学生“钻进”侵害公众利益的隐秘角落。面对力量大得多的对手,他们不停上演着“蚍蜉撼树”的故事,不惜打“一元钱”的官司,为遭到“千千万万个一元钱”侵权的社会公众发声;他们不做“法律上的沉睡者”,不仅让法律鲜活起来,更在细微之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 蚂蚁撼动了大树,螳臂挡住了车

“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诉讼中将公益事业推进哪怕一小步,那么千千万万个案件汇总起来,社会的公益事业将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眼看要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赵西婷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事情的起因是2000元的学习卡余额无法提现。

2016年,打算考研的赵西婷在网上购买了新东方考研课程。当她点开淘宝页面,感觉海报上的明星教师冲着她微笑,“犹如商场导购员,展示着橱柜里五颜六色的衣服,其他的根本没多想。”

之后她成功保研,和客服协商退款,课程的剩余款项被退到了学习卡账户内。而当赵西婷要求将余额提现时,新东方的客服“麻利”地拒绝了她,理由是学习卡的格式条款里有“不可提现”的字样。

“明明知道哪里不对劲,但我就是说不出来,非常拧巴,觉得自己被坑了。”和很多人一样,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赵西婷并不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一天,赵西婷准备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间隙,偶然听同学们聊起了“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这是颇令他们自豪的一项比赛。

2019年的第五届“小城杯”中,华东政法大学学生贾欣彤诉上海迪士尼禁带饮食案,案件以调解告终,贾欣彤获赠50元。此后,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动修改携带食品细则,优化安检流程,轰动一时。

“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同学“怂恿”赵西婷说。四名同学花了两天时间,决定参加第六届“小城杯”,并组建了队伍,取名“新西方队”。

今年4月,疫情期居家的赵西婷经历了9次网上立案失败后,终于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了“材料初审”。

对方的反应极为迅速,仅过了两天时间,新东方的客服人员就主动联系了她。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同意提现。不过,自我维权并非赵西婷的终极目的。在队员的坚持下,新东方同意对App内关于“学习卡账户”的余额提现功能进行上线和优化,预计两年内完成。在线上提现功能尚未实现之时,允许学习卡账户余额的线下提现。

诉上海迪士尼禁带饮食、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诉上海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返还交通卡押金案、诉苏州地铁票务规则案、诉中国知网不合理收费案、诉爱奇艺侵犯知情权案……

几年间,这些还未出茅庐的学生把一批知名企业、公立机构甚至世界500强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对簿公堂。

并非每支队伍都能幸运地诉讼成功或被人熟知,但参赛者们仍仍希望“蚍蜉撼树”能成为现实。一支参赛队休队的代表在诉讼失败后感叹道:

“案件虽然败诉了,但不代表我们的行动没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诉讼中将公益事业推进哪怕一小步,那么千千万万个案件汇总起来,社会的公益事业将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 想要成功立案,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可或缺

打了两年的官司,终于明白了那句至理名言——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沉睡者

比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院学生们纷纷从象牙塔中探出头来:诉讼的地方再也不是模拟法庭,法律书籍上的知识真真切切地落到了现实。

3个月、6位法官经手、9次立案失败,以及不计其数地修改起诉状。这是赵西婷立案路上留下的一串数字。

“立案到麻木。”今年年初,赵西婷每天8时醒来,几乎都会重复一个动作:睡眼惺忪地坐在床上看手机短信,看网上立案的审核结果,而结果往往又是“没立上案的一天”。但她并不气馁,又“机械性”地坐到电脑前,继续修改自己的立案申请。



▲2019年4月23日,上海市浦东人民法院,“诉得就是你鸭队”在与迪士尼方第一次开庭后留下了合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明芮近两年时间里收到的法院邮寄的立案通知书、传票、判决书、调解书。

## 推进法治需要这样的“较真儿”者

有一句谚语叫“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沉睡者”。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不完美、不完善的“隐秘角落”无可厚非。但古今中外,打官司对当事人而言都是耗费心力的过程:短期几个月、长期数年,诉讼成本高、门槛高。普通人权衡利弊后最终以忍气吞声告终是常态。

这场大学生公益诉讼大赛试图改善这一现象:以比赛为“梯”,让法学院学生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以普通个体的身份去亲历中国司法环境,直面社会和商业不尽完善处。

多年来,数千名大学生明知“蚍蜉撼树”不可为而为之,运用法治的杠杆,通过公益性质的诉讼,既为公共利益发声,也促进了社会微小却可感的改变。过程中,不少学生实践自身所学,明确了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

细微之处见精神。改变可能微小,但社会需

要“先醒来者”,将隐秘的侵权角落一一打扫。就算普通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浑然不知,但社会却因为“先醒者”的付出和努力不断进步。

不过,比赛的质疑也是学生们打官司的背景声之一:有人从审判资源的角度,认为比赛浪费司法资源,不宜提倡;有人认为动机不纯,纯粹是为了赢得比赛;有人觉得不过是一场“玩票”,是大学生版的“大家来找茬”……

但无论反对声音如何,都应该看到,在社会公平正义面前,何为本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最重要的标尺是公平正义,这是第一位的。没了这个标尺,就如同抽掉了大厦最底下的“基石”,无论上层建筑如何,也终将坍塌。

当前,中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中,检察机关的时间、精力、线索来源有所限制,社会组织提起诉讼也常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公益诉讼仍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出的论点全部总结在一张纸上,宛如进行一场沙盘推演。

“软件占用了大量的内存”“减缓了电脑速度,并带有广告”“被告并未告知捆绑安装其他软件”……李明芮将“硬邦邦”的事实和观点摆在了被告面前,不退让一步。尽管东北家中刚停暖气,但她“辩论得热血沸腾”。

今年5月,李明芮在家里收到了EMS快递。她立马撕开快递袋,直接翻到判决书最后的结果:胜诉。此后,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的远程调解下,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赔付李明芮700元赔偿款。

“打了两年的官司,终于明白了那句至理名言——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沉睡者。”李明芮长舒一口气。

“一元钱”官司值不值得打?这些看似以私益为名的诉讼,表面上是为“一元钱”,但背后都是公共利益的“千千万万个一元钱”

在一起诉某快递公司案件立案成功后几天,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张若涵在上课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电话那头第一句话就是“这案子几块钱,有必要起诉吗?”事情的起因是快递员未经告知,就把快递放到了快递柜里。她把圆通告上了法庭,索赔3.5元。

电话里,法官问她:“是不是在完成作业?”“一个学生大老远跑去立案是为了什么?”她没有主动承认,只能支支吾吾,因为“这种被质问的感觉很难受”。

“一元钱够你们来回路费吗?”“为了合同的几个条款,这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浪费司法资源吗?”“你们维权就是为了来参加比赛”……类似的质疑是众多“小蚂蚁”们奋力撼树的背景声

大学生以私益诉讼的方式去打公益的民事官司。以自己的“一元钱”为“筹码”,不计个人所得,为千千万万人合理合法的“要回”属于他们的“一元钱”而尝试和努力,这或许对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呼应和补充。

学生们的经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互联网上引发诸多网民的共鸣和声援。一位司法机关相关负责人多年为比赛成功举办多方沟通、斡旋、嫁接资源。他既被这些学生的执着所感动,也看到了其中的多元价值:

“一次绝佳的普法活动、一次社会法律意识的唤醒、一场公众对政府和企业运转的外部检视和平等交流。”

“一元钱”官司的价值却远不是“一元钱”能够体现。这场比赛或能成为棱镜,就日照之,成七色如虹霓。(本报记者兰天鸣)

之一。

贾欣彤清楚地记得,庭审现场迪士尼方的代理律师提交证据时提供了一张贾欣彤参加“小城杯”比赛开幕式的合照,质疑她是为了比赛而进行诉讼。这令贾欣彤有些出乎意料。

“他们把照片中的我用红圈圈出来,感觉就像圈出影视剧里面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有喜感。”贾欣彤笑着说。

“为了公益的‘一元钱官司’大费周章到底值不值?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侯玉芹长期和参赛学生打交道,知绝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人更明白其中的意义。

走在上海街头,她能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细微处感受到答案:开车在内环高架路上看到车水马龙,她能想起这些沪牌的拍卖保证金收取标准已从2000元降到了1000元;带着孩子去迪士尼玩“光轮极速”后,不用因为携带食品入园而被翻包或要求丢弃食物;花20元购买的地铁交通卡可以在上海的地铁站内方便地退卡和购卡……这些已经融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单纯从经济角度而言,学生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或许远大于胜诉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这些看似以私益为名的诉讼,表面上是为‘一元钱’,但背后都是公共利益的‘千千万万个一元钱’。”

今年10月,和赵西婷有同样遭遇的网友“J”给赵西婷发来信息:“我的学习卡都已经成功提现了,我还把方法也介绍给其他人,他们也都把钱拿出来。”

这些得益于赵西婷把自己维权路上的步骤、手段以及和解协议写成经验贴,发在了豆瓣、微博、贴吧论坛等社交网站。

最近,赵西婷惊喜地发现,在新东方学习卡购买合同中“余额不可提现”的格式条款已经消失不见了。

“心愿完成了,‘新西方’总算可以不用总是面对新东方了。”赵西婷说。

“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公益诉讼之路没有那么顺畅,但容易的事情往往没有价值,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

这场比赛引发的效应正像涟漪一样逐渐荡开。

比赛从最初的6支参赛队伍拓展到了32所高校、209支报名队伍,从首届只有一支队伍立案成功,到如今一届涌现出三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典型案例……今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还将“啄木鸟奖”授予起诉迪士尼的贾欣彤,表彰她作为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代表,不向消费侵权行为妥协。

“更多的‘小蚂蚁’正进化为‘啄木鸟’,这些大学生不愿意做社会‘隐秘角落’侵权现象的受害者和旁观者,而是试图成为社会法治进步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局长潘琼说。

参赛者谭惠曦依然记得,2015年伊始,在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格式条款一案中,团队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恰好此时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生效,立案审查制变成了立案登记制,“在踏入法院门槛这一步,感觉少了一头拦路虎”。

此前,她还向上海市交通委申请了行政公开。她原本对得到答复并不抱希望,甚至写好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诉讼起诉书。最终收到答复时,她感到很意外。

跨区域立案不便问题也正得到解决。全国绝大多数法院目前已经实现网上立案,跨区域立案服务在全国中级、基层和海事法院实现全覆盖,疫情期间网上立案数量在多地法院井喷,努力实现疫情期间追求公平正义“不打烊”。

“过去几届比赛中,不少参赛者为了立案需要在多地法院辗转。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期间可以进行网上立案,我也无法在3个月内进行9次立案的尝试,并最终完成立案。”赵西婷渐渐明白了老师在课堂上所说的电子诉讼提升审判质效的现实意义。

在比赛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主理吴辰眼中,比赛和参与者经历了被外界误解、怀疑,到被社会更多人认可、赞同的转变过程。这一点从被诉企业的应对态度就可见一斑。

“比赛期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企业试图通过非诉讼的力量影响学生打官司。更多被诉企业也展现出包容和积极的应对态度。有的企业在进入诉讼阶段前,就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完善了企业经营。”吴辰说。

如果不是参加比赛,赵西婷可能会选择息事宁人,“毕竟作为个体,想要改变社会不合理现象,确实犹如蚂蚁撼树、以卵击石。”

“但一元钱的公平正义也是公平正义。”她犹然记得第六届“小城杯”的颁奖仪式上,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的一句话——“公益诉讼之路没有那么顺畅,但容易的事情往往没有价值,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赵西婷和贾欣彤、张若涵均为化名)